

第四章 张之洞及其作《劝学篇》

通过对魏源、冯桂芬等早期「中体西用」思想启蒙者和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以及非主流派代表王韬、郑观应、陈炽、汤震等的「中体西用」思想的讨论，从中寻从「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发见，其内涵所包括的所谓「纲常伦理」是基本没变的，但从外延的角度观之，西用

范围逐步由军事扩大到富国富民，继而伸展到政治领域内，提出设立议院、建立法制的主张。实际上这一层意义尽管是在外延范畴内展开的，但已经触及内涵所谓永恒不变的中体内蕴了。由此可见，「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一步步的，而每一步又是以处延的变通作为整体发展的突破点。

时至清末，晚清政府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加之连年不断的内忧外患，虽然有洋务派曾、李等的所谓「新政」，但也挽救不了经济上的

输号，政治上的衰败，使其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之时，经济就本以可能性大之增加。特别是经过甲午一战，李鸿章精心营建的中国海军全军覆没，更加快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速度。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机，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在戊戌年间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明言：“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注1）思想明确，立场坚定地指出

思想史

批

100

变法是当务之急，是拯救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尽管戊戌变法最终是一次失败的变法运动，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同时，在维新时期，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新旧学之间的斗争，使得进化论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开始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考察中西文化和中西历史，改变了“渐变适不变”的传统概念。事实上，此时「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已接近极致，有冲破以往「中体西用」思想范畴的趋势。这一明显趋势的实质

对于维新运动的始末，在很广范围内和很大程度影响着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

本章将围绕讨论的重点，当从受法维新派的对立面代表人物张之洞入手，看他如何在正统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两面旗下，坚持其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以期对十九世纪末「中体西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变；对继续深化的中西文化论争做出历史的判断。

照稿紙

冊

冊

一、《劝学篇》问世前张之洞的思想轮廓

甲午战争后，中西文化论争和新旧学论争开始进入一个新高潮，此时张之洞的思想曾被

视为「中体西用」论的主要代表。不仅因为其思想主张符合强硬的守旧派，更由于其本身为官僚，所以他的言论主张在当时这场大论战中等于替统治阶级做了一个官方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所代表的「中体西用」思想，无论从时空上，还是从思想性上与都和甲午战争前大不相同。张氏的「

中体西用」思想主要通过其著《劝学篇》体现出来。为了准确地把握《劝学篇》的思想内容，实有必要就此之前的张氏思想的发展和形成做一番探讨。

现在一般研究认为，张之洞的思想结构具有“正统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双重特色。

由於张氏的思想是在传统体制教学的熏陶下形成的，其思想中对孔孟之道的拥护自然是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张氏的思想具有与体制教学关系十分密切的“正统主义”是可以理解的，更

张之洞

批

批

何况作为官僚的张之洞，其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是以当时既有体制的存在为前提的。同时，张之洞又是一个典型的洋务派，在湖北办了一些轻重工业和在当时看来新式的学校，主张“新旧兼学”，此亦视为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展现。这是他“实用主义”的部分。二者在张氏思想结构中的关系如何，是研究他的思想形成的关键所在。

从晚清经世思想来看，特点是实事求是，内容则着重于在不逾越传统体制的基础上实现

其想法，从这个角度上看，“实用主义”并未
 抵触“正统主义”。那么从张氏本身的地位上
 看，其“实用主义”的实践一旦超出“正统主
 义”所能容忍的限度，则意味着他与官僚制度
 的基础就会发生冲突；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就会发生对抗。这些不仅与他本身的地位和利
 益相违背，且也被官定朱子学理论所不容。由
 此可以料定，张之洞思想中的“正统主义”和
 “实用主义”之间并不冲突，可以理解为“正
 统主义”是其世界观，而实用主义不过是其方

思想

批

画

法端而已，维护其“正统主义”思想的工具。

一般而言，张之洞在光绪元年（即一八
 七五年）四川学政任内所撰写的《輶轩语》，
 （注2）可以视为其早年思想的代表。在《輶
 轩语》中，张氏开宗明义便表现了对经制教学
 的拥护。虽然他也指出只要“通经致用”地身
 体力行儒者教人为善的十三经，便不须求经学
 之外的他途捷径。（注3）而且在前后的《创
 建尊经书院记》中，他也再次指出“学”的“
 根抵必在经史”，而“读史之根抵亦在通经”，

认为此是“万古不变之理”，又以为“学术有门径，学人无旁援”，主张调和汉宋，认为“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注4）不过他对于制教学的官定朱子学似乎更为重视，认为“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而“四书”的注疏以“朱注”最精，（注5）同时在“宜学先正”条，更明确指出“钦定四书文即根抵”，（注6）所以看出其“汉宋调和”思想的落实，是以定制教学作为基础的。而张之洞所说的“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通经致用思想，

（注7）似乎仍类似鸦片战争前的经世思想的格局。

根据学者研究，张之洞在光绪七年（即光一八八一年）以前对西方的认识非常贫乏，（注8）直到出任山西巡抚以后，此一情形才有改善。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的《札司局设局讲习译务》所记为他在山西期间的思想的重要代表。他首先指出设译书局的目的是在于“筹知彼知己之法，为有文有文之固，并知时务以富民，明体达用以自立。”而主张“延

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的人才到“洋务局”训
习，而其所学的内容包括“天文、算学、水法
、地輿、格物、制器、兵法、条约、语言、文
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等各个方面。

同时也注意到西洋的“新式织机、农机”，认
为应该派员购买，“以为嚆矢”。（注9）由
此可见，张氏似乎已有在中国利用西器而“开
物成务以富民，明体达用以自全”的意图。所
以此时的张之洞西用的范围已由船坚炮利扩及
于民生日用之生产，也有以西法求富民的意味

张之洞

批

批

。而随着张对西方认识的增加以及西用之扩大
（包括对西学的认识），原有的“通经致用”
格局在用的范围的笼罩而逐渐退缩，日分化出
采西学的概念。这或许是张氏思想由“通经致
用”转向“中体西用”的表现。

张氏在其同时期的《延访洋务人才启》中
便进一步发挥其思想，“查中外交涉事宜，以
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通
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
、电法、律例为根据”，至于“入门”之经则

在“通晓各国语言文字”。（注10）仅就此而言，似乎张氏设立译各局的目的乃是偏重了了解西方，以便知悉理交涉为主要着眼点。无论如何，张氏已认识到“中外交涉事宜”的重点是在“商务”。（注11）

张之洞在山西期间有关设立译各局、延访洋务人才的主张，由于他被调任两广，而未能有机会落实。但是在此时期他的思想中的西用范围便已包括了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致、机器、兵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等诸多方面，并注意到西洋新式的纺织、农机。

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以后，也许由于中法战争的经验，使他对西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军事方面）。他虽不固主张设立译各局，却着手建设以引进西用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军事学堂。如“水陆学堂”，（注12）其课程乃着重于“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但他仍将中学视为根本，规定学员“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俾学生能“通知

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注13）同时，在传统教学方面，他也有类似崇经书院的建议。如“广雅书院”，希望藉此以“鼓舞士类，维持世风”，使学生“足以淑身比俗”，成为“体用兼备”之人才。（注14）

上述文武学校的建立，是张之洞“古今人才皆出于学”的看法，在其“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体现出二元教育方式。这是张之洞在广东期间思想的主要展现，也是他注重教育的思想的具体实施。

张之洞

张

张

在广东期间，除了设立文武学校，他对于仿西法求富也十分注意。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张之洞指出自“通商以来，各国挟其制造物产，以图中国之利”，中国如“不奋振作以图抵制”，则“财源日涸，民生日蹙”之下，“既不能富，其何以强”，并认为铁路是“富国之一大端”。（注15）这时他已清楚地提出富国先于强兵的见解，而且在前一年便筹划一些西式高军事设施的引进。使西学的范围已有所逐渐从军事范畴中解放出来的倾向。

自任督湖广以还，张之洞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他在湖北省城创建两湖书院，认为书院贵得“明体达用之士”，而将“肄业课士之法分为经学、史学、理学、算学、经济学”，（注16）其中算学以西学意味最浓，而“经济学”则或涉及西学。基本上，两湖书院是承经的，是广雅书院的延续，故其讲求经世之学，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于早期两湖书院和广雅书院的学生仍以取得功名为主要目标，故体制教学的味道似

照 耀 堂

舞

画

乎也是相当浓厚的。由此亦可见其「中体西用」思想中，中学的优越性。

甲午战争前夕，即光绪十九年，张氏继续强调“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主张设立“自强学堂”，分为“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认为“泰西语言文字为驳杂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算数为众学之门”，而“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主张加以学习。

（注17）至于所设的四门几乎全属西学范畴，

与两湖书院已有所不同，表现了张之洞「中西汇通」思想的架构在发生上的变化。不过，自强学堂相较于陆师学堂而言，其性质已有所不同，前者并不属于军事系统，而后者为专门学校，就此点而言，或不视为张之洞西学教育中的所高已从求强的范畴中分离出来。然而，西学在体制教育的范畴内所占份量仍不大，这亦从两湖书院的分科中看出。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六年），张之洞以署理两江总督的身份，主张“创设储才学堂”

张之洞

批

阅

，分为“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

（注18）就张之洞的思想而言，此一储才学堂，又不视为自强学堂系统的延伸。不过，就其分科内容而言，似乎更具有“实用性”。同时，他主张在各省设商务局，以促進便利商民之举，并鼓励集股成立公司，推动各种新式工商建设和本政建设，并且主张商办银行。（注19）

为了积极引进西用，同时张之洞也主张派人赴外国学习。（注20）

张之洞所谓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光绪二十

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当地四督湖广以办，便日始整顿武昌的教育，便自强学堂成为类似语文专门学校，同时改筹两湖书院，使其依照西方学堂办法，分科分班授日上课，并改课经学、史学、舆地和时务（后改算学）四科。（注21）两湖书院本是张风承继奔给，广雅书院所办的中式书院，此一系统的书院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中体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此时既采西式学校的方式，则毫无疑问是张风教育主张的另一转折点。

张风

张

张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张之洞意欲“合文武于一途”，主张设立“武备学堂”，提出“课堂以明其理，操场以尽其用”，规定“除教习课程余暇”，即令学生“诵读四书，披览读史兵略，以固中学之根柢”，（注22）与其水陆师学堂类似。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张风提出的“合文武于一途”的主张，不仅已注意到西方的全民皆兵制；就其所列的课程（包括：〈1〉课堂功课：算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造桥道制造之法、营阵攻守。

轻适之要；(2)操场功课：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队、行军炮台、行军铁路、行军电线、旱雷演试、测量、演习体操。)观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承认西学自身的体系。

无论如何，张之洞督湖广以后的教育改革和设立武备学堂的主张，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以前他的教育思想已有一定的差异，由改革两湖书院和成立文武合一的武备学堂，已可以看出在《劝学篇》提出前，他对西学大致上的认识状况和学标的教授内容的主张。

张之洞

批

画

总之，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到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劝学篇》提出前，张之洞“实用主义”的色彩似乎有越来越浓的趋势，其所欲引进的西学范围也越来越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正统主义”在其思想中退缩，而是由于出任疆吏以后，张之洞接触西方的机会越来越多，对西学的认识也就更广、更深，在不抵触“正统主义”的情况下，其“实用主义”的色彩也就愈来愈鲜明，故西学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此外，就其思想结构而言，他的“

“通经致用”思想最迟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已转为「中体西用」，而在两广总督任内由文武二科展现出来。在张之洞移督湖广以后，「中体西用」思想已转变为由传统书院（西训书院）和专门性学堂（如自强学堂）展现。当然前者仍包括算学学堂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当张之洞由署理两江总督回任湖广总督时，他对西训书院所实施的改革，已显示出其教育思想（「中体西用」）的改变，这在《劝学篇》提出后，就更加明朗化了。

原稿纸

无

版

注释

注1：梁启超：《政变原因答客难》

注2：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八年版，第一七页。

注3：张之洞：《輶轩语》，《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十二年影印本，卷二〇四，第九页。

注4：张之洞：《创建养正书塾记》，(引
与引书，卷二一三，第二_a页，二
四_a页。

注5：张之洞：《輶轩语》，(引与引书，
卷二〇五，第五_a页。

注6：同与注，第二_a页。

注7：同与注，卷二〇四，第三六_b页。

注8：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变
》，第二〇页。

注9：引之洞：《札司局设局训习洋务》

原稿

据

图

，《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九，
第二二_b~二四_a页。

注10：张之洞：《延访洋务人才启》，(引
与引书，卷八十九，第二四_{a-b}页。

注11：正文中张氏之言论足以证实当时他
已了解到商务在西洋诸国的“强”
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本文推论他
认为学习西法的重点应着重于商务
方面，并无不当之处。

注12：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

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第一一_a
~ = 三_a页。

注13：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同上引书，卷二十一，第二五_a~ =
x_a页。

注14：张之洞：《请颁广雅书院匾额折》，
同上引书，卷二十六，第二〇_b~ =
-_a页。

注15：张之洞：《致海署李中堂》，同上
引书，卷三三，第二四_b~ = 六_a页。

原稿藏

批

注16：张之洞：《咨南北书院调两湖肄业
生》，同上引书，卷九十七，第十
六_{a-b}页。

注17：张之洞：《设立伯强学堂电》，同上
引书，卷三十四，第二五_{a-b}页。

注18：张之洞：《创设储才学堂折》，同上
引书，卷四十四，第三四_{a-b}页。

注19：张之洞：《遵旨会同会议银行利弊
拟请仍归商办并由南北洋稽查以保
利权折》，同上引书，卷四十六，

第四_a~五_a页。

注 20: 张之洞: 《吁请修备储才折》, (同
 > 引书, 卷三十七, 第三一_a、三二_a
 ~三四_a页。

注 21: 苏云峰: 《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 第六五、六二页。

张之洞: 《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
 办法记》, (同>引书, 卷四十七,
 第二一_b~二二_a页。

注 22: 张之洞: 《设立武备学堂折》, (同

张之洞

折

同

> 引书, 卷四十五, 第一三_b~一五_b
 页。

二、《劝学篇》——一部代表官僚「中体
 西用」思想的总集

中日战争之后, 社会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进步学者和思想家鼓吹变革, 反对墨守成规,
 并逐渐认清旧制度的根本在于制度的改革。光绪
 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 湖南巡抚陈宝箴开
 扩变法改制, 甚至启用变法派(引进人物梁启超

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努力推行“新政”，当时作为推动“新政”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时务学堂”，由梁启超担任教习，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八年），梁、谭等人在湖南宣传民权，传播革命思想，虽然时间不长，却非常轰动，对全国影响很大，给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科举教学造成强烈的冲击，于是引发了湖南守旧人士的激烈反抗，并搜集了一些守旧人士的言论文章，编成一本名为《翼教丛编》的书，站在传统的立场，从理论上对变法派加以抨击。

四 梁 启 超

梁 启 超

梁 启 超

在一个时期内，使当时的湖南长沙既是一个戊戌变法运动基地，又是一个反对维新运动的中心。

与此同时，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尽管也在辖区内支持“新政”，但他已开始意识到变法思想倾向偏激。因此，他以梁鼎芬为总理，创办《正学报》，以阐明正学，宏扬圣道为主旨，并在同治三十三年中旬以后禁止《湘学报》在湖北经销，这表示他与梁启超等变法派正式分道扬镳。（注1）并从四月一日起以连载的

形式发表，而其中部分内容被收入《翼教丛编》内，因此署名《劝学篇》的主张，亦不归类为《翼教丛编》派「中体西用」思想。虽然对于张之洞为何发表《劝学篇》，学者界众说纷纭，但是就张之洞思想基础来考察，由于当时果启超、谭嗣同尊变法派的主张已经对其思想的“不统一主义”发生冲击，并与张氏在“不统一主义”容忍的范围内展现“实用主义”色彩的思想基调产生严重冲突，以及变法派鼓吹民权和进步思想，对其「中体西用」思想中的中

思想

批

批

体核心也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张氏在此时推出与其思想一脉相承的《劝学篇》，和变法派对抗，就其思想结构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本章拟以《劝学篇》的思想为中心，讨论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及其后的「中体西用」思想。

《劝学篇》写作时间约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三月间。此书不仅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实至名归的代表，也是其「中体西用」思想最有系统的呈现。该篇分为内外两

篇，张氏自称：“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正风气。”（注2）表现出其思想的轮廓。

内篇的第一篇《同心》，开宗名义指出，当时的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正社稷为第一义”，说明“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是“三事一贯”，并指出“保国”的优先性，至于所谓的“圣教”，一方面指涉的是“五帝三王”以降帝王“明道垂法”的“圣人之迹”，尤其是“教学法利”下官定朱子学系统的儒学。（注3）由此可见《对学

张氏

张氏

张氏

篇》思想的终极关怀，以及其思想的旧有的性。

特别是其中对国家（朝廷）的概念强调，显示出某种程度时代意义。

同时他对于作为“中法”核心的三纲五伦赋予绝对性，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所谓不变之道，也就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中“所因”的“三纲五伦”，并引用朱熹注解的“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乃是“不得不与民受其君”，而“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载，更无异议

“，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莫在于此”。（注4）在“变法”篇中，张之洞再次强调“中法”核心的不变之“道”的重要性，“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而所谓的“道本”就是“三纲四维”，并认为一旦弃之则“法未行而大乱作矣”。（注5）

在另一方面，由于张氏强调“西学亦有别，西艺为要，西政为要”，（注6）又提出“不可不变者，编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注7）使人易

曲解张

氏

对

误解张氏对制度改革关注的程度，事实上张氏所谓的“西政”只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其所谓的法制并不是根本大法。（注8）由此可见，张氏对制度改革的主张似乎仍停留在有限的行政系统以及采用西法以增补中国的结构。

在“中法”与“西国”的关系上，“新旧兼学”是张之洞“设学”的主旨思想，他在讨论《学堂之法》时指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而“西政西艺西史为西（新）

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

(注9) 在《会通》中又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注10) 而且在前述强调“道不变”的状态下，认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注11) 主张“变其法”而“能变器”。(注12)

为了解决这种“道”不变而“器”变的理论之下形成的“道器”分离状态，张之洞在某
种程度上也采取了“西学源出中国说”和“托
古改制”的方式，希望以此“会通”，成为仅
图强盛

时者的藉口。后者，张之洞一方面说“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调西学”，另一方面，他则强调如果“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本”，则“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并认为“中士而不通中学”，就好像“不知其姓之人，无髻之骑、无舵之舟”一样，(注13) 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学”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将中学视为根本。通过如此的“会通”、“循序”，原如以中
国核心以三纲五伦的绝对化作为前提，张之洞便能达到洋为中用，而不失其为中为目的。但

20x20=400

NO

是如前提及的，以“西学源出中国说”和“托古改制”作为“中学”与“西学”连接的媒介，在张之洞的思想中是否真正成立，终究尚缺乏事实的基础。

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的奏折中，张之洞除了主张废除八股文以外，对经制教学的拥护则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废八股并不是废四书五经，并害怕“不力定式，恐策论出题”界限过宽，故主张正名为四书义、五经义，其中出题必须是经书原

文，文法则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而并不引用“违背经旨之言”，（注14）表现出他对经制教学是不原理的拥护。同时，由张之洞一贯秉持的教育主张来看，经制教学毕竟较西学具有优越性和较具决定性，这一点似乎是无庸置疑的。

无论如何，在考察张之洞《劝学篇》思想时，必须掌握其中所核心的偏常名教的绝对性与优越性，以及对民权思想的批判，由此可见其改革在理论上的极限。另外则必须掌握其对

而学的重视，此正展现其引进西学功能的一面。而此二者也正表现出《劝学篇》「中体西用」思想的双重性格，即如晚清务派领袖张之洞与守旧派在拥护既有体制与社会原理与一体比。

就此一时期的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而言，其西用的范畴与郑观应、陈炽、汤震等人相较之下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呢？前面曾提及郑观应、陈炽、汤震三人的「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是设立议院的主张，那么在此

国史纲目

撰

1000

便先讨论张之洞的相关思想。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于设立议院的主张持反对意见，认为当时中国民智尚开化，且外国必须「家有中贤」者才得送议员，而华高「素鲜巨贤，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餉，必推诿默怨，议与不议等耳」。（注15）就

此而言，张氏对于议院的筹款作用甚有注意，却未正视其在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功能。由此观之，张之洞不仅西用范畴未包括议院，其对议院的认知也不及郑观应、陈炽等人。

20X20=400

NO

当然在此时张氏也没有排除未来设置议院的
的可能，而主张先大量兴办学堂，培养人才，
等到人才日盛以后，再考虑设立议院的问题。
这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为议院根本的见解，
与郑观应等人并无不同。然而是否一定要等“
学堂大兴，人才日盛”以后才能设立议院，则
是其中的主要不同所在。就必先有议院的社
会环境和文法条件，才能引进议院形式的立场
而言，张氏的见解自然不被接受。但是，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设立议院的提供

实际操作的环境，便缺乏实习的机会，则合乎
议院制度的文法条件恐怕不是仅与人民之素质
须提高便可以达成的。更何况议院制度的引进
本身，便与原有的制度和文法条件互动。对
于产生合乎议院制度所需的文法条件而言，也
有所助力。就此而言，郑观应等先设立议院，
同时大兴学校，培养人才的主张，也是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而两者相较之下，张氏较高保
守色彩的事实，也昭然若揭了。更何况张之洞
具有相当影响力以经学全曾重印汤震的《危言》

(注16)就汤震的议院主张而言，主要目的不过是由现有的官僚参与，以便对君主提供更佳的资讯而已。对于这种议院，张氏在此时也未主张采用。此一事或许更有助于对张氏此时思想的了解。不过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他便主张由官员推举成员组成议院。但即使如此，较诸郑观应、陈炽等人的议院思想，他的议院组织无疑更缺少西洋议会政治的色彩。

通过以上的讨论，张之洞在这个时期中的议院主张并未包括在其西用的范畴内。那么，张

之洞除了承继前期洋务派主流的“器物”层面和枝节的行政改革的西用以外，他的西用范畴在政法方面比起郑观应、陈炽、汤震等人，是否也有缩小的趋势呢？

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形成过程及其《劝学篇》中观之，他的“西政”虽也包括律例，但是对于法院的运作方式、涉及人民权益的刑法等方面而言，并未纳入西用的范围内，故可判断他在这方面的西用范畴明显比郑观应等人小。

总之，就《劝学篇》时期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西用范围较诸前期「中体西用」论者郑观应、陈炽、潘震等人，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有缩小的现象。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思想，其西用的范围似乎仍沿袭前期洋务运动的概念，止于“器物”层面而已，比较郑观应等「中体西用」论者的西用范围，明显退缩。而相对其时中体不变性的强调与维护，则成为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特色。

—— 张之洞 ——

—— 张之洞 ——

同时，鉴于当时社会上已形成的“变法维新”热潮，引起守旧派强烈反对，新旧学之争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所以《劝学篇》在主张新学旧学“不使偏废”的基础上肯定西学在社会中国起作用，认为“旧者不知道，新者不知本”，会使“不知道则无应故知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如此争论下去将“学者操之，中无所主”。（注17）这在某种程度与有折中，有让新旧学之争停止的意思。当时光绪皇帝读了《劝学篇》后，大加欣赏，认为

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

(注18) 加之张之洞本身为权势官僚，故使得《劝学篇》中的「中法两利」思想在当时相当流行。甚至更据一些守旧知识分子将《劝学篇》的其中五篇内容编在一本名为《翼教丛编》的书中，因喻维新力量针对利权。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把张之洞的《劝学篇》视为一部代表官僚「中法两利」思想的总集，实不为有过。

照稿紙

冊 四

注释

注1：杨肃献：《晚清的变法思想（一八九一～一九〇〇）》（台大历史研究所，台北。）第一八六页。

注2：张之洞：《劝学篇序》。

注3：张之洞：《同心》，参阅《劝学篇》；或《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二〇三页。

注4：张之洞：《明纲》，见《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一三〇页。

注5: 张之洞: 《变法》, 同×引书, 卷
= 0 =, 第二_a页。

注6: 张之洞: 《劝学篇序》, 第三_a页。

注7: 张之洞: 《变法》, 《张文襄公全集》, 卷 = 0 =, 第十九_b页。

注8: 张之洞: 《设学》, 同×引书, 卷
= 0 =, 第九_b页。

注9: 同×注,

注10: 张之洞: 《会通》, 同×引书, 卷
= 0 =, 第四八_b页。

注11: 张之洞: 《变法》, 同×引书, 卷
= 0 =, 第二_a页。

注12: 张之洞: 《劝学篇序》, 第三_a页。

注13: 张之洞: 《枢序》, 《张文襄公全集》, 卷 = 0 =, 第 = x_a = 八_a页。

注14: 张之洞: 《论议科举新章折》, 同
×引书, 卷四 + 八, 第三_a ~ 四页。

注15: 张之洞: 《正权》, 同×引书, 卷
= 0 =, 第二_{a~n}页。

注16: 参见 D. H. Bays, op. cit., p. 44.

注17：张之洞：《劝学篇序》。

注1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大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六册，第204页。

附录

附录